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2/PV.45
26 October 1987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第四十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0月21日星期三，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先生讲话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12〕：
 - (a) 理事会的报告〔第六章（C节）〕
 - (b) 决议草案
 - (c) 修正案
- 工作安排
- 东南亚的和平、稳定和合作问题〔42〕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87-64268/A

上午10点35分开会

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先生阁下讲话

主席：大会首先由乌干达共和国总统讲话。

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先生在陪同下走进大会厅。

主席：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邀请他对大会讲话。

穆塞韦尼总统：阁下，你迄今为止在主持大会讨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技术清楚地肯定了选择你担任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的崇高职务是十分正确的。我相信，在你的指导下，会议定能取得有意义的结果。

我们乌干达人刚刚纪念了我国独立二十五周年。然而，在这二十五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中，我国人民在独裁者和杀人犯的统治下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为了结束法西斯主义及其种种表现，乌干达爱国者组织了一场武装斗争，于1979年推翻了阿明，1986年推翻了奥博特和他的继承人。1986年1月，最初有27名青年人发起的全国抵抗运动及其武装组织全国抵抗军胜利地推翻了专制和法西斯主义政权。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带来的变化并不仅仅是表面的，而是一场根本的变化。我愿向大会谈谈这场变化的性质。

在极度困难的时候，任何一代人都确实常常把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选择看作是空前严重的。然而，我们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会同意，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讲，我们这一代人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更加确实地处于人类历史的十字路口。就在我们在此开会讨论的时候，人类已经掌握了空前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用来团结我们，拯救我们，也可以被用来摧毁这一星球。

那些在我们这代人中把人类活动领域推进到外层空间的人们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某些不容否认的事实：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宇宙中一个叫着地球的星球上；我们

大家的命运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在一起，不管我们是否了解或接受这一事实；一般常识决定了我们要生存就要合作，而不能对抗；我们需要相互援助，而不是以强凌弱。在地球上显然存在着五花八门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哲学思想，但这一星球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时间中已经明显地变成了一个统一的生物圈，一个有良知的生物统一的系统。人们可以在伟大和渺小的事物中，在各国互利或有害的相互联系活动中看到这一事实。

显然，建立联合国就是为了使我们日益明确共同命运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的主要宗旨是：

“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伸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

我们时代的伟大任务必须是老老实实在地评价国际社会为实现这些崇高目标取得了什么进展，有什么不足。

我们将如何进入二十一世纪呢？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时地球上的科学发现与精神价值是否已为生存提供了一个共同目的？也许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时准备使用我们的太空技术，消灭我们星球上的所有生灵？

我们坚信人类的生存以及我们个人与国家梦想的实现都与《联合国宪章》以及其他国际条约与宣言中所阐明的理想与价值切切相关。

尽管我们仍有许多不足，但我国仍然顶天立地地致力于维护联合国的最高宗旨。在全国抵抗运动领导之下的乌干达政府首先开始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尊重人权，尊重人的生命。为了维护人的自由，改善我国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我们进行了反对暴政的长期战争。这也就是我们政治计划的基石。

乌干达目前已生气勃勃地恢复正常，有些公认的例证也表明了这一积极趋势。在此我只想简单地提及国际大赦组织所发表的最新报告。该报告指出：

“国际大赦组织注意到1986年乌干达在改善人权方面有了重大进展。”

罗杰·P·温特尔先生是美国难民委员会干事，这位著名人士在访问了乌干达许多地方之后在今年七月写了一篇颇有见解的文章，题为《乌干达军队与人权》。以下是其文章中的一部分：

“我所见到的情况使我确信，全国抵抗军在对待传统上是民族敌对分子的平民时”——这是作者的观点，在我国并无传统的敌对者——“比乌干达民族解放军（已溃败）要好得多”——乌干达民族解放军是我们所击败的军队。“显然军纪的整个情况以及与平民的关系要比以前那支军队在八十年代上半叶的表现要好，这是值得欢迎的改变。”

目前不少难民正在返回自己的国家，这也许最确切地说明了我国正在拨乱反正。因为只有难民真正相信他们回国后有安全保障，而且他们的财产也有保障，才可能返回家园。我们政府自执政以来的表现本身也胜于雄辩。联合国高级难民署与我国政府所公布的数据表明，自1986年以来乌干达人返回家园的比例迅速上升。例如自1986年1月至1987年7月的18个月中，有二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一人返回乌干达。也就是说平均每月有一万两千五百五十五人返回乌干达，这比我们执政前的四十一个月中平均每月返回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三百六十二，也就是说从1986年7月至1985年12月返回国内的总人数只有十四万两千五十五人。联合国高级难民署所公布的数字表明截止于1987年中旬已有两万难民从肯尼亚返回乌干达，三万难民从卢旺达返回家园，十七万六千五百六十人从苏丹返回家园，另有两万五千八百八十五人从扎伊尔返回家园。国内另有成千上万离乡背井的人重新回到故乡，安居乐业。

通常对人权的定义就是不进行人身骚扰、言论迁徙自由并有权拥有财产。我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遵守人权，但是全国抵抗运动也非常清楚，要真正实现人权，必须从根本上改善我们的社会经济状况，这也是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

一个吃不饱饭的人是不可能真正享受生活乐趣的；一个病人也说不上是一个完人。一个值得称道的组织，如国际大赦组织，积极为根本人权而奋斗，受到了

欢迎。但是，尽管这些组织非常重要，但对那些从生下来就受到饥饿与疾病折磨的成千上万的人来说，这些组织很可能是没有意义，甚至是不相干的。我们在此要指出的是，在贫困、疾病、无知与经济落后的状况下是无法确保人的尊严的。在这种状况下，这些努力对由于欠发展所造成的真正人权问题来说是次要的。仅此言论自由、不受逮捕以及诸如此类的方面去谈人权是不能的。人权也应该是不受饥饿，以及可以居住在不漏雨的屋下。不能只谈人权的一小部分，而忘记了人权的主要内容。

我认为，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十年前大会宣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我认为，也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大会才进而将许多有关社会经济权利的详细公约包括在内，而这种社会经济权利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享有的。我们谈到人权时应将其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只谈其一部分。人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部分，包括政治权利以及没有匮乏不受饥饿的自由。人权应该是一个整体，而不是某些分枝。

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全国抵抗运动政府已开始实行一个复兴国家的现实而有计划的计划。

尽管非洲非常富饶，但我们的人民却一贫如洗。有关我们社会经济状况的数据非常具体，也使人感到非常不安。

例如成年人每天所需要的热量大约是二千五百卡。但在非洲大部分地方，大多数人每天只有三分之二所需要的热量。营养不良到处可见。乌干达是一个土地非常肥沃的国家，而且气候宜人，但许多地方人口中营养不良的比例已经高达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三，有些地方甚至更高。据统计1987年6月每一千人中就有十八人早逝；分娩过程中的产妇死亡率为百分之零点五，幼婴死亡率为百分之四点七。婴儿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十点八。相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二。我想在瑞典婴儿死亡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七，与我们百分之十点八的死亡率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我们1986年取得政权时，1985年出生的婴儿未满周岁就死去的比率是百分之十二，据预计，将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儿童在未满十五岁之前死亡。虽然这些死亡本身是一个悲剧，但是更可悲的是婴儿死亡率与发病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来自于那些可以接种疫苗加以预防的疾病。麻疹以及由其引起的并发症，例如腹泻，呼吸道感染占1982年死亡率的百分之五十四，占1984年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五，它目前仍是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其它可以预防的疾病，例如百日咳和结核，在我们执政前仍不断上升。我们开展了一个强有力、迅速的免疫规划，复盖面达主要对象的百分之五十六，在农村的比例略低，不过，我们决心在最短时期内达到百分之百的复盖面。

乌干达的平均寿命是55岁，虽然比最低的1980年的53岁有所进步，但比起例如相应数为74岁的美国，仍然是一个很低的比率。另一个更复杂的情况是，乌干达目前医生与人口的比例是1：31,000，其它非洲国家的比例也许还要更高——识字率，男子为百分之六十五，妇女为百分之四十五，与法国相比，那里的男女识字率都是百分之百。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我们平均每人收入每年下降百分之二点九，是目前世界最低收入国家之一。这一事实反映了我们的落后以及不发达状况，这是许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特点。

总的来说，大部分国家拥有的经济机构由于固有的不对称的发展导致永久的不发达和资源流向国外的现象。我这里所指的是基于农业的为了糊口的落后部分与一个畸形，与前者截然不同的现代部分。一般来说在最现代进出口部门与落后的糊口部门之间不存在正常联系。存在的只是寄生式的有利于现代部门的联系。例如，矿井的劳工领到的工资不能维持家庭生活，也不容许他们退休。他们靠土地勉强糊口，得不到现代技术的好处。他们不可能指望领取养老金来度过晚年。时常，农业人口生产的咖啡或棉花由该国上层转卖给外国。然后用这些产品换取的外汇购买威士忌、香水、录象机，而原料生产者却一无所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部门寄生于另一个部门的情况。这种不平衡现象不但存在于所谓现代部分以及经济的其它方面，而且也存在于农业与工业之间。部门之间没有联系。半现

代化部门与先进国家的经济联系，特别是与那些西方国家的经济，而没有任何内部的凝聚力。通常，那些拥有旅游业的国家，自己无法提供服务，例如，供应旅游者的玉米片、果酱、奶酪、酒都要从第三世界以外进口，而那些工厂不过是装配厂而已。

这样的资源外流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我们应还记得奴隶交易，健壮的人被抽去美洲，和加勒比为美国和西欧国家做廉价劳力，以此换来的是镜子、念珠和小玩意儿。这种做法造成非洲社会的严重人力外流，这个情况仍然在发生。对这种不等价交换的过程无止境地延续，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阻止，将会变得更糟。如果我们继续以有价值换取无价值，以铜换假发，以咖啡换香水，棉花换豪华轿车，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将无疑会继续扩大。

对非洲，包括乌干达局势，有许多曲解，特别是在思想方面。当我们与阿明、奥博特的腐败、野蛮暴政做斗争时，许多人对我们的思想方向进行揣测。人们常问，我们是亲西方还是亲东方。我认为，这样乱贴标签是对非洲人民的污辱。其前提是非洲人民不拥有自己的合法利益，他们唯一的作用是支持西方或东方国家集团的利益。这种态度与倾向是错误的，混淆视听的，更是不幸的。我们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即使是最低等的动物，例如阿米巴原虫、水螅或蚯蚓，也会知道自己的利益。他们知道如何去寻找赖以生存的食物，知道如何躲避危险，辨别敌友。他们却不是人，而是最低等的生物。为什么非洲人不知道自己的利益，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为什么我们要由东方或西方来告诉我们什么对我们有利？我们的运动反对这种思想方法。

正如我早些时候向大会指出的，去年在我们刚开始执政时，我国每年有96,000儿童死于以下六种可预防的疾病：麻疹、白喉、破伤风、小儿麻痹症、百日咳和结核。然而，96,000这一数字并不包括那些死于其它使大批人致命的疾病，例如，疟疾和胃肠炎。对此，难道我们需要美国人或俄国人告诉我们让96,000位儿童死于可以通过接种疫苗预防的疾病是不能接受的吗？为什么要用东西方冲

突的观点来看我们改变这种可悲局面的规划？ 我们也有自己的利益。

我国政治规划的第10点规定了一个综合经济经济战略。 我们要强调，这一规划谁也不亲，只亲乌干达。 我们有自己的利益，不需要亲任何人。 我们反对教条主义、简单化，理论的庸俗化和生搬硬套。我们要从每一个制度中汲取对我国最有利的东西，拒绝不利于我国的东西。 我们不对其它国家的经济妄加评论，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国家都最了解如何去满足自己人民的需要。 因此我们希望，虽然我们是一个小国，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借此认为他们最了解我国的经济情况和人民的需要。 我们有自己的合法利益。 我们应按照他们如何对待我国利益来区分敌友。

我已经谈了我们斗争的背景，以及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的背景。 我高兴地向大会报告，自我们取得政权以来，我们就不失时机地执行我们的基本方案，以转变当时在我国存在的那种悲惨的情况。 我们正在维修和调整工厂，以保证有更多的产品符合当地的情况和价值需要。 我们正在维修公路和公共设施。 我们为公共交通进口了交通工具，为农业进口了设备。 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已经同意同我们进行合作以完成这项任务。 在这一最低的复苏方案完成之后，我们将扩大农业生产并使之多样化，建设新的加工厂，提高发电量等等，以保证我们能够转变我们人民的生活。 我们必须完成所有这些任务。

对这一进程来说关键的是技术转让。 技术水平低是非洲大陆被殖民化的原因。 如果我们的技术水平不低，我们是决不会被殖民化的。

除非我们建立自己的技术基地，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维持我们的政治独立。 这项任务是艰巨的，但同时也是轻而易举的。 之所以说是艰巨的，是因为我们的人民已经习惯一种无能为力和依赖性的奴隶思想：在我们取得政权的时候，甚至连用来把纸张订在木板上的大头针也是从外面进口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这项工作并不那么可怕， 因为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在做在我们之前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必须做的开创性的工作。 只要我们勤俭、明

智和有创造性地使用和利用我们的资源，我们就能够从国外的伙伴国家购买到这种技术。 我们已经开始执行一项进口替代的方案，我们将不断地提高当地需要的价值，充分地利用我们的自然资源，以进一步执行这项方案，尔后我们将能够根据自己的生产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潜力是不小的。 当然，进口替代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生产都必须以一系列的设施如电力、水、通讯和基础设施为基础，我们正在大力地重新发展这些设施。

在重新建设的同时，我们也开始逐渐地增加农业生产，以供国内消费和出口。 更具体地说，我们正在恢复传统的出口产品，比如铜、棉花、烟叶、茶叶和咖啡，并且开始生产传统上只为当地消费用的其他农产品以供出口。 我指的是玉米、蚕豆、高粱、葵花籽、大豆等等。 我们也正在恢复牛肉、奶制品和皮革工业的生产，而且正在重新发展渔业和木材工业。 这样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广泛的原材料基地，使我们能够获取更多出口收入。

在完成我们的进口替代工业方案，改进我们的基础设施，和扩大和改善农业之后，我们将着手解决工程方面的问题，以便我们能够开始为我们的机器制造某些必需的零部件。 我们将逐步地发展生产工具制造和机器制造设备的能力。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建立一个独立、一体化和自立的民族经济方案的组成部分，并列为我们政治方案的第五点。

这些努力将得到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很大的协助，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东部非洲、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的分散的市场集中起来成为一个能够维持大型工业的市场。 使我感到高兴的是，现在已经在15个国家的优惠贸易区的安排之下做出了努力。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下面几点。 第一，我详细地谈及了经济问题。 这是因为我认为如果没有解决其经济更好运转的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就不可能维持自己的增长，使自己的人民摆脱贫困，或者维持自己的独立。 贫穷的要饭者决不能挑三拣四。 如果我们长期贫困，而同时又要维持我们的独立，那是不可能的。 此外，

我们没有必要成为贫困者，因为我们拥有自己的资源，只要勤俭地管理我们的资源，我们就能够实现发展。

第二，我已经指出，我们有了一项经济变革的彻底方案——毫无疑义，我们的方案是彻底的。我们并不为此感到抱歉。我们的人民有权利过好的生活。然而，这项彻底的方案并不是针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其他人的。这项方案是针对我们自己的问题提出来的。这项方案是针对乌干达的。我们的人民必须享受我们国家自己的丰富资源。因此，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对我们的彻底方案感到不安，当然除非它是想在乌干达寻求不合法的利益。任何在乌干达有合法利益的人都没有理由对我们的方案感到担心，我们的方案显然是彻底的，因为我们希望改变我们人民的条件。我们并不为此感到抱歉。

在国际事务中，我们支持三大事业：第一，使人们摆脱自然界的支配。第三世界人民应当能够驯服和利用自然来满足自己的利益。第二，支持人们摆脱其他人的压迫。第三，我们也支持各国人民、各民族和各国摆脱其他人民、其他民族或其他国家的支配。我们认为这是三大事业。

在我们大陆的南部地区，仍然存在一个狂妄的种族主义集团在南非压迫我们的人民，其压迫方式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然而，南非人民正在进行一场英勇的斗争，尽管种族主义者采取狂妄的态度，但是我们的人民终将在不远的将来取得胜利。从历史上来看，压迫者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直到最后灭亡，这是历史的悲剧。南非政权采取偏执、放肆和狂妄的态度，根本无视非洲和世界的舆论，它认为自己可以通过颠覆非洲、侵略安哥拉，在南非国内实行镇压来阻碍历史的潮流。有谁试图阻碍历史的潮流而又得逞的呢？历史上有多少拥有更大力量的镇压性政权垮台呢？

因此，不管是非洲人民，还是全世界都没有必要悲观或胆怯。在非洲有许多力量可以加以利用，这是对我们大陆南部地区一小撮种族主义者非常不利的。种族主义者越早认识这一点，对他们自己、对整个南部非洲就更有利。

关于国际合作，我们认为，特别是西方国家有道义上的义务在经济上帮助第三世界，因为过去它们以奴隶、矿石和原材料的形式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掠夺了许多资源，而且数百年来，或者数十年来一直侵犯着我们国家的主权。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决策是根据外国人的欲望，而通常是不利于当地人民的。

因此，出于道德，西方国家应该补偿目前第三世界国家流向它们的资源。这是一个道义上的义务。然而，第三世界国家不能将外援当作发展的战略。相反，它们应该坚持公平和平衡的贸易安排，以使自己有能力购买机械、工具和技术。我们乌干达人并不强调援助。援助是有限的，仅仅具有象征意义。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与拥有高级和中级技术的国家作出互利的贸易安排，以使我们的经济能够变成一个独立、一体化和能够有助的经济。

大会目前处理的问题之一是后天免疫不足综合症（艾滋病）：我对此特别高兴。我们乌干达人认为，艾滋病是一种具有潜在严重性的公共卫生问题。我们同样认为，这是一个全球问题。我国在1982年第一次确定了这种病例。从1987年年初起，据记载共有一千一百三十八起病例。我们以公开和诚实的态度来对待这一问题；这一疾病已经不幸在国内得到了过分的重视，并在国际新闻媒介中得到了过分的宣传。然而，我们将继续对这一问题采取公开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艾滋病是可以预防的，只有大力开展公共教育，我们才能够制止这一疾病的扩散。我们认为，一味辨认这一疾病的起源只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如果将这一疾病的起源归罪于某一个种族，那么这是十分不幸的，因为这些观点并没有在科学上得到证明，只会推迟彻底消除这一疾病的努力。我声明，我们非常赞赏世界卫生组织目前为止开展的工作，并呼吁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大的全球一致努力。

最后，我重申忠于本组织的崇高理想，因为我们充分认识到，一个整体的性质只能是其各个组成部分特性的反映。如果一个医生仅仅通过观察人体内几亿个细胞中的一部分就可以确定一个病人的命运，如果我们承认筑成令人敬畏的宇宙的一砖一石实际上是肉眼无法看到的物质粒子，那么我们就必定会认识到，在乌干达和

其它类似的无数第三世界小国内发生的一切可以恰当地衡量出我们国际大家庭的命运。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乌干达共和国总统刚才的重要发言。

乌干达共和国总统韦里·穆塞韦尼先生在陪伴下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 12 (续)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a) 理事会的报告 ([第六章(C)节]) (A / 4 2 / 3)

(e) 决议草案 A / 4 2 / L. 7

(2) 修正案 (A / 4 2 / L. 9)

主席：我提请大会注意作为文件 A / 4 2 L. 9 散发的对决议草案 A / 42 / L.7 的修正案。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丹麦大使昨天代表欧洲共同体 12 个成员国发了言。我要对我国政府支持摆在大会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 (我们高兴的是这项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补充几句话，并且也对在国家和国际的水平上处理艾滋病问题的普遍途径说几句话。

我国政府完全支持摆在大会面前的决议草案 (A / 4 2 / L.7)，这项决议草案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在国际社会反对艾滋病斗争中的协作。艾滋病是世界上最紧迫的健康问题之一。向它作斗争要求人们尽一切努力一方面防止那些没有得这种病的人受到感染，另一方面同时医治那些这种传染病的受害者。我要着重强调秘书长昨天说的话。这个问题要求在最大程度上进行认真和紧密的国际合作。艾滋病是威胁到所有人民的现象。象滥用麻醉药品一样，象原子放射性灾难的影响一

样，这种疾病是没有任何国界的。我们必须一起向它作斗争。需要一种共同的因素。

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便在国家范围内控制艾滋病并与之作斗争，既然到目前为止既没有疫苗也没有任何医治艾滋病的真正有效的药品，除其它事项以外，这些措施包括促进研究工作和促进科学情报的国际交流，在我国，这种国际交流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艾滋病合作中心进行的。当然，我们还采取措施开展向全体人民——特别是最易感染的人群提供情况的运动；把艾滋病特别专家分配给公共卫生官员；通过各试验室义务的——我在此强调——不知名的报告来改善流行病学资料的状况；以及改善对艾滋病人和受到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感染的人的医学、护理和心理社会治疗和照顾。

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特别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国家之间进行的双边合作的一部分，旨在与艾滋病作斗争的援助项目得到优先支持。这些项目将重点特别放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流行病学研究作为预防措施的基础；培训医疗人员；支持提供有关情况的运动；制定诊断艾滋病和对血库供应进行化验的适当的办法；改进受到艾滋病威胁的领域中的一般医疗基础结构。

在大会今天讨论的决议草案中，世界卫生组织在向艾滋病作斗争中的主导作用正确地得到强调。我国政府完全支持这种途径。在今年6月9日举行的威尼斯经济首脑会议上，联邦总理科尔说，在国际一级，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个协调世界范围内向艾滋病作斗争的各种努力的最合适的论坛。我要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并感谢他和他的合作者昨天向大会作了极好的简单介绍。世界卫生组织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提供人员和物质支持。我们希望，重新承认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一领域中的主导作用将有助于尽可能避免出现重复现象。

此外，决议草案明确地认可载于今年5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第四十届会议通过的第WHA40.26号决议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战略。参加世界卫生

大会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完全赞同这项决议，我们高兴地说，我国政府奉行的公共卫生政策与这项决议是完全一致的。

我还要再谈一点。在向艾滋病作斗争中，确保所采取的措施不仅能够有效地向艾滋病作斗争，而且同时符合人权原则，这是极其重要的。

我刚才提到，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了一个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合作中心。最后请允许我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准备继续、并特别通过这一中心进一步发展与世界卫生组织之间现存的极好的合作，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艾滋病特别方案同样进一步发展与所有感兴趣的国家之间的合作。

恩德赖菲先生（匈牙利）：我有幸作为其代表发言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充分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传染性的艾滋病是规模极大和具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感的国际卫生问题。该疾病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不仅威胁着某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威胁这全体人类。其在人类痛苦、医疗事业的代价以及社会效果方面的影响是可怕的。

我们赞赏世界卫生组织根据艾滋病在全球的范围、规模和复杂性以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而为战胜这种疾病所做的努力；与其他国家一道要求加强国际社会各方面的合作，以便使世界卫生组织能够继续发挥其指导和协调全世界抵抗艾滋病的紧迫和坚决的斗争的作用。

如此规模的全球问题要求全世界做出反应。艾滋病造成的全世界的紧急状态要求在国家、地区和国际范围内采取紧迫和积极的行动，以发展传染病学监测手段和加强对防止、控制、诊断和治疗的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的研究、国家卫生人员的训练以及其他如预防、控制和研究等有关领域的活动。我们认为，商业利益不应成为这一努力的主要动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所代表讲话的这些国家支持世界上对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我们在各自国

家里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对艾滋病进行紧张的斗争。作为对国际努力的必要贡献，我们这些国家愿意与别国分享和向外传播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经验。

既然艾滋病威胁一切社会而非其中的某些阶层是一个事实，各国和国际上关于预防、控制和治疗的计划和体制，应当是非歧视性的，使无论任何社会地位的人都能够享受。我们这些国家都认为，有必要保证控制艾滋病的全球战略应当在各个层次上——国家、地区和国际上——得到有效地执行，并由联合国和秘书长参与，以协调行动，从而实现遏制、逐步减少和最终停止这种传染病的传播。我们已准备考虑和支持任何旨在预防、控制和最终在我们的后代人之间消灭这种流行病的合理建议。

因此，我所代表发言的这些国家将衷心支持澳大利亚代表所介绍的这一决议草案的内容。

弗姆先生（瑞典）：我愿代表北欧五国——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谈一下本世纪最严重的健康危险的问题之一：后天免疫丧失综合症或称艾滋病。

世界正面临着既影响发达国家也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的流行。它不仅对公众的健康而且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而每个单独的艾滋病病人首先就是一个人间悲剧。艾滋病存在于世界上一切大陆，因此必须作为全球问题加以解决。很明显，如果我们要在征服艾滋病方面取得有意义的成果，就急需做出协调的国际努力。我们今天在全体会议上讨论该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令人鼓舞的。

北欧国家赞赏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一新的全球健康问题做出的迅速和有效的反应。该组织雷厉风行地汇集各种知识、技术和热心人员，成立了一个艾滋病的特殊预防计划。但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财政方面的限制迫使其依赖于自愿捐款来执行艾滋病特殊预防计划。

北欧国家充分支持世界卫生组织抵抗艾滋病的工作纲领，并迄今已认捐了该计划捐款四千四百万总额的一千七百万美元之多。除此之外，我们在与世界卫生组

织的紧密合作中，也正在提供与艾滋病有关的双边援助。亟需为采取实际行动和提供技术援助而提出共同的战略和为各国所同意的建议，以便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制订各国行动计划。

这不仅是在科学上努力的问题，也是在道义上领导的问题。我们在对阻止艾滋病流行而采取措施，必须调动我们所能得到的一切声援、人道主义支持和对人权的尊重的力量。我们必须反对一切侮辱某个阶层人士、歧视、社会孤立和敌视被传染的同胞的倾向。

我现在愿谈几个需要进行国际合作的具体问题，并在这个范围内指出，北欧国家出于各种原因，认为国家内或国家间强制进行人体免疫丧失病毒检验不是遏制人体免疫丧失病毒传染的扩散的有效手段。我们认为，这种措施恐怕在征服艾滋病方面很难有实际意义，相反会不利于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在国际上的自由迁徙。我们认为，提供关于人体免疫丧失病毒传播的危险的知识，是对付这种疾病扩散的更好的方法。我们应当发起面向公众的大规模推大知识的运动，并且在平时应当向受到威胁的不同阶层人士传授知识。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是极为重要的，但必须承认，艾滋病不能仅作为健康问题加以解决。这是一个影响到社会上所有人并因此超出健康范畴的问题。实际上，艾滋病的危机需要采取经济和社会措施，并需要人们有强大的政治意愿。举个例子可以阐明这一点：

反对非法药品的斗争必须得到加强。如果我们能够制止吸毒的嗜好，就会大大缩小传播人体免疫丧失病毒的一个途径——即通过受污染的注射针头传染。

卖淫是疾病传播的另外一种根源，需要对此加以更大的注意和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保护儿童的行动必须得到加强。这种疾病将给世界上带来更多的没有父母和其他家庭照顾成员的儿童。

大量二十岁到四十岁的人将会死亡。这种疾病在造成人们痛苦之外，还将给很多国家带来严重的人口和经济后果。因此，抵抗艾滋病的斗争将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

一大批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在为对付经济衰退而进行斗争。例如债务危机及其带来的调整过程已经对这些国家的社会支出造成了巨大的限制。尽管艾滋病问题日益发展，卫生部门却可能要削减紧急预算。我们还认为，国际社会的目标应不仅是制订一个战略，而且还应支持国家行动计划的制订和开展。这使得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变得更为紧迫和需要。

最后，我们对战胜艾滋病有着集体的责任。这个疾病不分地理疆界，因此必须以协调的行动对付之。因此整个联合国系统——特别是联合国系统内的世界卫生组织——必须动员起来与艾滋病进行斗争。作为成员国我们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通过我们慷慨的财政捐款，通过我们的政治决心，也通过在这场人类灾难面前实现国际团结。

菊地先生（日本）：首先，我愿感谢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哈夫丹·马勒博士和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特别方案主任乔纳森·曼博士所做的内容丰富的介绍性发言，祝愿他们在履行自己重要的新工作方面取得圆满成功。

我国代表团愿就项目 12 发表一些意见。

后天免疫不足综合症（艾滋病）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它正引起世界所有人民的关注。这种疾病的病因至今还没有完全搞清，因此也没有充分的手段对其进行治疗。艾滋病的所有病例看来都是致命的，因此它可能在各国内部以至全世界造成严重的社会甚至政治影响。

到昨天为止，全世界已有 126 个国家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 62,438 个艾滋病病例。虽然目前病人数目仍然是有限的，很明显这个致命的疾病正在全世界蔓延。

我国代表团愿意强调，艾滋病不会顾及国家或地理疆界；它是一个国际社会必须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使用它所有能够使用的智力、科学和医疗资源。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在问题真正爆炸之前采取果断和适当的措施，就有可能控制艾滋病的蔓延。

我国代表团重申，对付艾滋病的战斗必须现在就开始，整个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系统都应参加。为了使这个努力取得最大限度的效果，必须在各个水平以一致行动采取各种措施对付这种疾病。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这个作用通过该组织艾滋病特别方案和它的全球战略指导和协调全世界为防止和控制这场可怕的传染病而进行的战斗。世界卫生组织依靠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有现有机构必须尽一切努力推动情报和研究成果交换，以及对这种可怕疾病的教育和大众知识普及。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已发起行动，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对付艾滋病的计划。我国代表团愿强烈敦促所有适宜的组织，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一道加入全球反对艾滋病的斗争。

日本欢迎在过去一年中在全世界为对付艾滋病而建立起来的地区规划和国家规划，我们认为这些规划对推动世界卫生组织所采取的措施将是非常有益的。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愿请各成员国注意由日本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于本月初在东京联合主持召开的为控制艾滋病和其他人类反转录病毒感染及乙型肝炎制订综合战略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使大家分享日本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和经验。

日本认为这次会议是非常有益的，特别是在执行现有的国家和地区方案方面。具体地说，日本在控制亚洲流行病乙型肝炎和在几个亚洲国家流行的成人T细胞白血病方面已经进行了相当的研究并取得了较丰富的经验。我认为象我们所取得的这种经验将有助于发展控制这种流行疾病的方法和途径。

1988年1月将在伦敦举行关于预防艾滋病计划的卫生部长高级世界会议，我们认为这将大大推动国际社会对付艾滋病的斗争。

在日本艾滋病也同样被看作是一个严重的国际性健康威胁，尽管迄今为止在日本被报道的病例尚不足50个。

建立有效的和综合性的措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最紧迫的

任务。因此我国政府今年2月份决定建立关于艾滋病问题的部长委员会，以确保政府有关机构间的密切联系和协调，并推动对付这种疾病的各项措施。委员会在其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控制艾滋病国家计划，这个计划确定了将要采取措施的以下5个主要领域。

第一，传播关于艾滋病的准确知识；第二，加强监督系统；第三，加强初级和次级预防措施和咨询服务；第四，推动国际合作研究；最后，作出适当的立法安排。

为防止艾滋病，民众必须从政府和非政府来源并通过所有可能渠道得到必要的信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传染的危险。还必须采取一切可能措施防止二级传染，例如追查那些曾与艾滋病患者接触过的人。

此外，各会员国必须进行合作，努力改善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国际措施。同时，还必须在国家和国际各级鼓励试验室和院校的基本临床研究工作。

鉴于问题的紧迫性和国际社会对艾滋病的极大关注，日本参与了提出关于艾滋病的决议草案，澳大利亚代表在本次会议开始时对此已作过介绍。

最后，我国代表团希望重申，日本随时准备帮助加强国际社会为早日消除艾滋病而作出的努力。为此目的，日本正在考虑发动自愿捐款，援助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一极为重要的领域中的活动。

卡班达先生（卢旺达）：大会今天讨论的问题是引起国际社会——从政府领导人到偏远乡村的居民极大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不仅仅限于搞清后天性免疫缺乏综合症（艾滋病）存在与否，或者是否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危险，而是要发现这一疾病的真正性质、原因、传播方式、后果、治疗方法以及如何来根除它。卢旺达代表团认为，辩论的目的在于提请国际社会注意危险的严重性，并呼吁大家团结一致来与疾病作斗争。根据官方报告和新闻界信息，有120多个国家受到了这一前所未见的灾难的侵袭，据讲，某些地区的情况要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世

界各地都已响起了警报。这个问题已成为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无数次辩论的主题，而且也成为政治领导人之间的话题。

在针对艾滋病作出的各种反应中，我们特别注意到了某些人的反应，他们虽然相信艾滋病的存在，但却尽量缩小其严重后果，试图以此来安慰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没有作出必要的努力来保护自己或社会。这种失败主义的态度是非常危险的。拒绝承认艾滋病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并不能消除艾滋病的存在及其实际后果。当然，也有人夸大艾滋病的影响甚至给它打上政治标记。遗憾的是，由于很多原因，这种态度是普遍存在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它除了可能损害某些国家的利益外，还可能在某些社会阶层之间造成一种坏风气，打击受感染者的信念，而这些人本不应被当做贱民看待。

最后，还有一些人，他们承认艾滋病毒的破坏性和致命性，与此同时，努力来治疗受害者，并设法制止艾滋病的传播。许多政府持有这种态度，应当得到支持和鼓励。

鉴于艾滋病正在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问题已不在于把病根归咎于某些国家、地区或社会少数，而在于应当团结一致来设法控制艾滋病。要想在国家、分区域、区域和世界范围消除这一灾难，各国政府、科学家和医疗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社会行动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要想找到公正和适当的解决办法，必须冷静、细致地作出坚持不懈的普遍努力。

我不是一名科学家，当然也不是一名艾滋病专家。然而，我感到，在事关人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安定的如此敏感的一个领域，并非每个假设都是好的，都应当加以鼓励。因此，大会应当明白，认定某些地区、国家或社会阶层为艾滋病的地理起源或其主要繁衍区，特别是适用其效果尚未经科学或临床证实的技术或制品，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关于艾滋病，正如在与公共保健有关的各个领域一样，我们当然必须依赖人类智慧，但也要寄希望于各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警惕性，对于世界卫生组织采取

的预防行动及其为提高公众认识和控制艾滋病而做出的努力，我要表示赞赏。

在目前阶段，看来最应当做的事情是使公众保持消息灵通并认清当前的形势。有关信息必须做到家喻户晓，因为鉴于艾滋病的性质，在国际社会中没有哪一个群体可以存有侥幸心理。

卢旺达政府不想缩小、更不想掩盖艾滋病的邪恶。这种疾病确实存在。是可以感知的。但它必须通过共同的努力来加以消除，因为事关各国人民的健康。

我国国家首脑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总统阁下在最近一次中央政府官员会议上谈到艾滋病的时候说到：

“尽管我不是这一疾病的专家，但是对这种疾病所具有的致命性质还是有着足够的了解的，我有责任请那些负责公众健康事务的官员注意他们对公众健康所负有的道义和技术上的责任。

“不应当使错误的谦虚感妨碍他们进行工作。这项工作首先包括对公众进行客观、冷静和普遍的教育，使他们了解这种疾病的性质，感染这种疾病的危险及如何保护自己防止感染此类疾病的各种有效方法。这是迎接这一挑战的最好方式，也是人民所期望的，首先，妇女和母亲——为自己的孩子感到担忧，也为自己感到担忧——有权利了解，有权利要求给予他们同这种疾病进行斗争的方式，如果我们不加小心，这种疾病可以成为一场新的灾难或瘟疫。

“其次，需要一项巨大的项目鼓励研究并公布科学发现，使人们对这种疾病有更深刻的了解，使研究工作有助于寻找解决方案及治疗方法，这样才最有利于我国及该地区的所有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社会。

“这将是我们对解决这一问题的贡献，这个问题是全世界所有主管健康部门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将这一贡献归功于我们的传统，归功于我们的尊严。”

卢旺达正在进行一项同艾滋病进行斗争的全国性方案，这项方案完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制订并通过的全球性战略。我愿借此机会代表卢旺达政府和人民对各友

好国家及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组织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对我国公共卫生和社会事务部监督下的全国艾滋病问题委员会给予的宝贵的物质、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

昨天开始的有关艾滋病问题的一般性辩论将会被证明是在许多方面都有益的。它将使大会能够对人类医学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的规模作出估价；它将使大会得以作出结论，认为有必要在各研究中心和其它地方对艾滋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而且认为有必要在国家一级采取坚决的、全面的行动。在这方面，有权威的技术协调作用便落在世界卫生组织身上，我们对该组织再次表示我们的感谢，并祝愿它获得成功。

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在非洲一些疾病已经夺去而且正在继续夺去许多人的生命，艾滋病使这种疾病的数量又增加了一个。我们希望同麻疹、疟疾、小儿麻痹、脊髓炎、白喉、破伤风、肺结核及其它传染病的斗争将不会失去势头，不管是现在还是在今后的岁月中。在这方面，我们也是不断地同国际社会保持积极的一致，特别是同国际卫生组织的行动保持一致。

圣法尔先生（海地）：主席先生，因为这是我国代表团第一次在本届会议的全会上发言，因此我想借此机会衷心祝贺您被选举担任我们组织的这一高级负责职务。我们还愿向您保证我们支持您及主席团的诸位同事值得赞赏的努力，我们也愿向他们表达我们良好的祝愿。

我前面的发言人已经详细地谈到艾滋病灾难的许多重要的方面，有关这一问题的权威人士一致认为艾滋病已经发展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具有全球性传染病的性质。我们在联合国应当应付我们所处的地位所固有的这项挑战，因为我们是同各种仍然普遍存在于集体下意识中的迷信和根深蒂固的偏见进行斗争的最后堡垒。一些在其它方面很先进的社会现在正在日益表现出种种从心理上来讲很明显是倒退的态度和行为，就象古时候的人所作的那样追捕并杀害那些疾病患者。还需要我再次回顾迦南前《利未记》中对圣经时代的所谓的麻疯病是怎样治疗、怎样放逐的吗？还需要回顾那些“圣病”患者即使是在最后极其痛苦的癫痫症阶段命运有多么暗淡

吗？还需要回顾让·马丁·沙科的“大瘰症病”患者受到多么野蛮的待遇吗？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仍然记得这种极端野蛮的行为，他们认为这些“萨林式的迫害”令人奇怪地联想到最近那些假科学家表现出的狂热性，他们将深为海地人这一事实包括在有可能患艾滋病的危险因素中，从而开始某种时代精神的潜在趋势。这是某些西方研究者的科学主义还是或许是下意识的种族主义？我们不得而知。

那位庸医，一个著名中心的主任，如此不公正地损害了海地的良好声誉，对我们只能说，用一位伟大的古希腊语言研究者的话来说：

“你对别人做出了许多坏事。”

至于他的名字我还是保持沉默为好，理由很清楚不必解释。

总之，表明病源的最近资料应该驱散了无知和欺骗的企图。但是，我怀着理智的同情心指出：我不仅忘却给我带来的痛苦，而且仍然记住未来的好处。应该记住，某些偏见是很难消失的，在确凿的事实面前也难屈服。

在巴赫扎克夫人领导的法国卫生部里，我看到世界医师协会，可能宣布艾滋病人权宣言的一项建议。显然，这是在巴黎举行的专题讨论会内容的一部分。既使我作的是即席发言，我也想将部分内容列入这次发言。案文中10条重要规定如下：

第一，从医学和法律角度讲，艾滋病如同任何疾病一样，也是一种疾病。

第二，那些感染上病毒的人们受习惯法保护。绝无例外。

第三，根据国家法律，应该毫无限制地向带菌者提供医疗保健。

第四，不管感染病毒者是什么种族、国籍、性别或宗教，任何人都不得限制他们的自由或权利。

第五，不论现在或将来，在没有感染病毒者的同意的情况下，谈到这一疾病应被视为是错误的，并应根据可适用的法律加以惩罚。

第六，必须惩罚出于歧视动机而采取的行动；这类行动可能会剥夺感染病毒

者的就业、住房或保险机会，可能会限制他们参加集体活动，比如入学或参军。

第七，必须尽可能保证输血、抽血和注射不致造成危害。

第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在有关人士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寻找病毒的工作。

第九，为寻找疾病而必须进行的一切检查一定要在不透露姓名和保密的状况下进行。

第十，在医生之间和在医生和病人之间一定要严格遵守医疗保密制度，特别是对担任公职的人员，更应该是这样。无论现代医疗技术的要求如何，都不允许违反这条规定。医生所掌握的资料只能用于医疗目的。任何脱离这一道德规范的行为都应受到惩罚。

这并不一定是法国政府或海地共和国的正式立场，但我建议，各国代表团，特别是马勒博士和曼博士组成的小组能够考虑这些内容；该小组一直在认真地考虑这一威胁着吞并我们大家的流行疾病。

我国的公共保健政策充分的反映了世界卫生组织政策的主要内容，提交大会审议和通过的决议草案也坚持这些主要内容。因此，我国代表团高兴地同澳大利亚代表团一道提出关于研究、防治和动员一切必要手段同我们时代的这场灾难进行斗争的决议草案。

该决议草案具有宽宏大量的精神和广阔的概念构架。该构架完全符合罗彻斯特大学乔治·恩格尔教授的观点；他认为，这种疾病应该被视作为生物—心理—社会现实。此外，由于可能产生的方案纲领建议我们按照保罗·图尼埃的方式考虑到人体健康的所有因素，这就允许我们现实地希望，我们将努力创造必要先决条件，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在没有任何猜疑，即普遍可靠的科学情报基础上尽全力开展有效的运动。让我们一直战斗到世界的末日。

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听取了最后一位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请马达加斯加代表发言，他想介绍载于第 A / 4 2 / L . 9 号文件中的修正案。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我作为非洲国家集团10月份主席感谢秘书长和马勒博士；他们在此就题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防止和控制后天性免疫不足综合症（艾滋病）”的议程项目做了发言。

非洲国家认识到艾滋病的严重性，这种疾病不分大陆、不分种族和阶级到处都发生；因此，非洲国家为了表示关心国际社会为同这种疾病进行斗争而作出的努力，毫不犹豫地向世界卫生组织传递适当情报，为同艾滋病进行斗争建立国家委员会，制定短期和长期方案，支持国际或区域论坛提出的各项文件。大会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认识到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重要性，这是令人满意的。

情况也可以与此不同，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在使扑灭艾滋病世界战略得到通过的行动中描述了这一疾病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及人口影响。它与联合国机构保持了持续的对话和合作，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同时还由于艾滋病在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直接和非直接的开支，还与世界银行进行了合作。用马勒尔博士的话来说世界卫生组织迅速地作出反应

“以面对这一疾病及其所有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

如果我们承认世界卫生组织拥有一百六十六个成员国，其基础比大会更广泛，如果我们记住从体制上来讲世界卫生组织是指导和协调世界卫生活动的权利机构，如果我们热忱的尊重并正确地捍卫不应该出现重复的原则，我们就能够理所当然的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7年7月8日的第1987/75号决议表示满意，经社理事会是一个与大会，安全理事会和国际法院并列的联合国机构。

但是，在对待艾滋病这一重要问题上，只要能够分清各自的职权范围，分别开展工作并不是坏事。非洲国家并不反对大会的主张和大会就这一问题作出决定，但大会在这样作的时候有责任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祝贺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地区和国家一级所作的努力，请各国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战略来指导各自的行动并且请联合国系统的机构、双边和多边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慈善机构与世界卫

生组织进行合作。

有必要在这里重复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是按照早已清楚确立的规则进行的，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必须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报告，该理事会将继续对这一问题负责。同样，我们认为执行秘书没有必要向大会报告，因为他必须向世界卫生大会报告并可能向世界卫生组织的执行局报告。此外，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总是可能使大会注意该报告的某一个别方面，这一个别方面由于其特殊性可能要求我们采取行动。

我想大会不会无视艾滋病问题的复杂性而试图取代世界卫生大会或甚至由此进行控制。当前的优先事项是与艾滋病进行斗争，只有有利于加强这一斗争的其它考虑才是合适的，但是这些考虑不应该使我们忘记这一优先任务，也不应该用来作为实行没有得到一致同意的单方面或仓促措施的理由。

这些就是使非洲集团国家提出载于第A/42/L.9号文件中的修正案的理由。这些修正案并不反对直接关系防止并控制艾滋病的第A/42/L.7号决议草案的主要建议。提出这些修正案是受了我们所遵守的原则的启发。它们寻求保证使大会作出的决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采取的行动之间保持某种和谐，根据《宪章》第六十三条经社理事会

“为调整各专门机关之工作，得与此种机关会商并得向其提出建议，并向大会及联合国会员国建议。”

尽管如此，我们愿意进行磋商，我们已经提出了进行这样的磋商，我们希望提高世界公众的认识，但并不对事情进行夸张，我们深信，世界公众认识到尽管在方法上存在着分歧，但是当我们谈到艾滋病时，无论是在世界卫生大会、世界卫生组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或大会我们讲的都是同一样语言。

我们诚挚地希望大会将尽早达成协商一致。

主席：我通知会员国、大会将在晚些时候就第A/42/L.7号决议草案和该决议草案的修正案(A/42/L.9)作出决定，日刊将通知具体的日期。

议程项目8 (续)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会议委员会主席的信 (A / 4 2 / 5 4 8 / A D D . 2)

主席：根据大会第40/243号决议第一部分第7段、会议委员会建议授权联合国训练与研究学院董事会在本届大会期间召开会议。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通过这一建议？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42

东南亚和平、稳定和合作问题

主席：经过就这一项目进行协商，现在建议，鉴于最近的事态发展，为促进东南亚的和平、稳定与合作，决定推迟审议该项目并将此列入第四十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如果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就这样决定。

主席：对议程项目42的审议到此结束。

工作方案

主席：我通知会员国工作方案有了变化。对议程项目26“国际和平年”的审议推迟到10月28日星期三下午进行。

下午12点30分散会。